

# 一战后的旅欧华工、勤工俭学生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

卫金桂 王章维

[内容提要] 一战后到欧洲的华工、勤工俭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深切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一些人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在理论上得出了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结论;在实践上,积极建立先进组织,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盟,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一战 旅欧华工 勤工俭学生 社会主义运动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2)04-0089-04

因一战之故到欧洲的华工、勤工俭学生,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欧洲作为社会主义的故乡,欧俄华工和勤工俭学生对社会主义的感触和介绍,对与科学社会主义颇有隔膜的中国来说,更具特殊意义。

一战爆发后,由于法国劳动力严重不足,1916年起,中国有华工到了法国。后来,留法勤工俭学纷纷而起,“留法勤工俭学,几为举国公认之唯一要图。”基本目的仍是学习资产阶级文明以救国。五四运动后,旅欧勤工俭学运动掀起高潮。由于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信仰的动摇,勤工俭学生的目的有了变化。如周恩来所说:“殆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舞,求知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生人数约计1700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多为小资产阶级,但欧洲却将他们中的多数锻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如欧洲共产主义研究会一致认为,“我们来欧留学的目的,从前虽有种种,然到现时,其重心所在,不外把自己养成为一个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和创造共产主义社会的人。”这种自觉转变主要通过以下过程和认识表现出来:

首先,战后欧洲的社会现实使一些人深切认识到西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本质,认识到资本主义为何物,促使他们中的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

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经过战争打击的欧洲经济萎缩,为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华工首先遇到了无以为生的巨大压力,勤工俭学生也被抛入仅为面包奔波而不能兼学的贫困者行列,二者在经济处境上已无区别。他们不仅感受不到自由博爱的气息,还遭受到苦力待遇,亲身体会了资本主义以掠夺别国和本国劳动者生存的事实。他们从中明白,资产阶级政府以人民当炮灰,掠夺的大量财富仅供极少数人享乐,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仍过着贫苦的生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命运是相同的。也就是在这种认识前提下,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看破了其残酷和虚伪:所谓基督精神,“不必来向我们这些炮弹下的牺牲品做宣传。就是我们死后,金牛儿也可变卖我们的灵魂呢?基督教的精神应当在资本主义国内、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财政部及企业和金融机构作宣传。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才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大敌。”

1921年冬勤工俭学生争取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一批人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当时,勤工俭学生为能在该校与官僚子弟得到同等受教育权,于2月28日占领该校。副校长褚民谊竟要求里昂市长“逮捕匪类”。次日,该校被法警包围,许多学生被捕。这次斗争颇具国外五四运动的味道(有些报纸就如此称呼),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

的斗争中,学生们已将《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变为“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明确反映了该事件与勤工俭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被关学生越狱未成者104人(其中有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立三等)被遣送回国。此事使勤工俭学生彻底觉悟:所谓文明之邦的法兰西,原来与中国国内一样黑暗!这批人的遭遇对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周恩来说:“他们虽自己承认一无所得,但是他们岂真一无(所)得?数万里的海程他们辛辛苦苦的来了,更悲悲惨惨的回去,劳动的真实的的生活被他们尝着了;中法文化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识破了;社会现象的不平,东亚西欧如同一辙,也被他们发现了;纯洁的青年人格,更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这岂不是他们大有所得?”他们从中最重要的体会就是:“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需联合起来!”李立三谈到这一事件对国内的影响时说: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从直接目标看是失败了,但“他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人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行列。

其次,勤工俭学生通过对战后欧洲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比较,在理论上得出中国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的结论,并且在行动上积极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与苏俄和世界无产阶级建立联系。

面对战后欧洲严重的经济困难,各国政府不仅不设法救济民困,却搜索枯肠榨取利润、扩充军备。不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劳动人民在战争中为资产阶级付出了重大牺牲,战后仍是他们为享乐和重新发动战争所榨取的对象,生活毫无保障。这使勤工俭学生深切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和剥削、压迫、战争密不可分的,要想免除这些灾难,必须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种认识前提下,他们从思想上抛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信仰,成为十月革命的忠实信徒,认识到:“在过去历史中,革命的事件本屡见不一,最大的法兰西革命,美利坚独立,也颇能震动一时,各

有其历史上的相当价值。但一持与俄国革命相较,则广狭远暂的不同,又不难立见。”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范围只限于谋各个民族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而俄国革命,“便转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来了”。因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利用近代科学技术,对外进行殖民扩张,造成了人类的空前浩劫,到一战结束,“已算入到他的崩溃期了”。继之而起的俄国革命与此完全相反,它“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革命的始基了”,而且“其立足之点在于全般的社会革命,而非仅限于一国一种一阶级的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实在是负有重大使命,不过他才做得世界革命的起首罢了。”旅欧青年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将该团的责任概括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列宁的所谓‘学习共产主义’。”旅欧青年团执委会下属共产主义研究会发行《共产主义研究会通信集》,专门交流会员研究共产主义的体会。

旅欧青年团于1922年8月1日创办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后被《赤光》半月刊代替)。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蔡畅、郭隆真等都是主要负责和经常性撰稿人。周恩来在该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是勤工俭学生宣传共产主义的代表性文章。他说:“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欲期未来社会造出自由发展的人群,自不能不造现今的人类脱去物质上的桎梏;欲期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自不能不先使现今的人类全无产化了,好绝灭这个最大的乱源。因此,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到共产革命的切要。”针对国内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旅欧共产主义对其进行了批驳,并用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中国除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少年》还开辟了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事评论等版面,刊登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们“以世界大势律中国<sup>⑩</sup>,将其研究的观点介绍到国内,对国人了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动态和国内建党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旅欧共产主义者还十分注意与世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蔡和森认为:朝鲜、日本、波斯、印度、土耳其都应有人去,尤其是日本最为重要,“中日间要两国无产阶级联络革命才能解决”。<sup>⑪</sup>他联合世界

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实地考察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旅欧共青团派遣团员前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3年“九月间将由这边赴俄的,约有二十至二十五之多”。<sup>④</sup>首批受派遣者有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刘伯坚、聂荣臻等。

第三,积极建立共产主义组织,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盟。

基于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认识,勤工俭学生中很快就有人着手培养革命干部,组织社会主义团体。赵世炎、王若飞、熊雄、陈公培、盛成等组织劳动学会,并积极组织勤工俭学会,以“成为政治革命团体”<sup>⑤</sup>,还建议和推动国内进行建党工作。蔡和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中国于二年内需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sup>⑥</sup>他还准备组织一批人赴俄工作。“将来以俄为大本营,至少引一万男女长驻工作”,该团体注重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两点。国内和欧洲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建立了联系。1920年11月,陈独秀委派国内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欧洲筹建共产党。次年,在欧洲的周恩来、刘清扬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共旅欧支部)成立。他们还在华工中发展共产主义组织。

赴法华工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给予了深切关注。如华工杂志《新工人》在创刊时写给另一工人组织赤社党的信中说:中国的解脱方法,“唯有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打破一切掠夺本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sup>⑦</sup>旅欧华工总会与旅欧共青团关系日益密切。勤工俭学生积极投身于华工义务教育,为他们普及文化知识。在争取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中,不少华工与学生站在一起,学生已“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sup>⑧</sup>华工中的优秀党员马志远、袁子贞等后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如果说,以法国为中心的勤工俭学生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较华工作用更为突出,在俄国,华工的作用则是主要的。

一战爆发后,沙俄从中国雇佣了大批廉价华工。据不完全统计,人数达二三十万之多。他们在俄国受到沙皇政府残酷的压榨,如在修筑摩尔曼斯克铁路时,英国工人、俄国工人和中国工人工作时间分别为8、10、10小时以上,所得报酬却分别是7—8卢布、1卢布又20戈比、80戈比。<sup>⑨</sup>这些中国农民在俄国受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之一。

1918年初始,在苏俄支持下,已有华工积极分子在一些大城市组织起了中国人的革命组织,正式表示赞成十月革命,如“莫斯科华侨协会”声称“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惟一的民有民享的政权”。年底,各华工组织代表成立全国性旅俄华工组织——留俄华工联合会,不久发展为拥有6万会员的群众性组织,该组织被苏共承认为“无产阶级组织”,其机关报《华工》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在俄国和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sup>⑩</sup>苏维埃地方组织发行各种中文共产主义宣传品。阿穆尔省仅从1920年5月5日到11月1日,就散发中文共产主义宣言和传单2.3万份,用中文出版的小册子5000份。苏维埃地方政府还利用各种形式,在华工中宣传共产主义,用办党校等方法培养华工干部,并创造一切条件,使华侨自由离开苏俄,到1918年5月为止,华侨回国者达4万多人。<sup>⑪</sup>意图是要他们回国后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回国侨民当然也会对十月革命情况作介绍。

1920年6月,在留俄华工联合会基础上,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成立。该局成立次日,部分党员致信列宁道:“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我们追求的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解放。在中国,五亿劳动者,向俄国的无产阶级伸出了手。”<sup>⑫</sup>1920年,中央组织局派10名华籍共产党员回国,试图与国内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促进国内共产主义运动起了一定作用。

苏俄政府在华工中作了大量政治工作,加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决心,起到了明显作用。据1919年9月13日俄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收到的电报,在西伯利亚,华人能组织起20万人的队伍。<sup>⑬</sup>这些人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微薄资产及身家性命在俄国,主要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

仰,并力图将俄式革命引入中国,解决中国问题。1918年6月13日《红军》杂志的一篇报道颇能说明这一点。该文指出:“中国人非常关心俄国革命的进程。他们几乎每天举行集会,期待着在最短时间内出版布尔什维克的中文报纸,以便为这些红军营服务。在同中国红军战士的谈话中知道,为了实现中国的革命他们希望得到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华工在亲身经历了俄国革命后,自然而然地将俄国的情况和中国比较,从中深切体会到俄国革命与以往中国革命的不同:“在我们中国,常常发生革命,但是,我们贫民们依然是老样子:得到好处的只有那些官老爷们。”<sup>⑭</sup>而苏俄革命却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他们眼里,为苏维埃而战,就是为贫民,也就是为自己而战。所以,华工部队“完全是由旅俄华工组织自己首先倡议,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指挥而且完全由中国人中的志愿革命者组成的。”据苏方统计,在苏俄的所有中国军队中,都有共产党支部,每个连就有几十个华人共产党员。<sup>⑮</sup>他们将俄式革命看成解放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道路。如当段祺瑞政府参与协约国对俄武装干涉时,莫斯科中国侨民和华工举行全体会议,指出:“莫斯科的中国侨民相信,只有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才是世界上惟一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政权。”<sup>⑯</sup>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对苏维埃政权的干涉。

1918年11月30日,列宁接见了中国华工中的华南和华北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他们向列宁汇报了中国情况,“并使他深信,中国劳动人民将全力支持苏维埃俄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的正义斗争。”<sup>⑰</sup>1919年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召开,上述二人作为华工代表列席。张永奎在成立大会上发言时对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明确表示了向俄国学习的愿望。列宁通过与张、刘二人的接触,较深了解了中国民众对俄国革命支持和向往的态度,这成了俄国向中国积极推进共产主义的重要参考依据。

注释:

郑名桢编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第35—36页,第262页。

《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载于天津1921年5月9日《益世报》。

周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之最后命运》,载于《周恩来早期文集》(下)第250—251页。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十月革命》,载于《周恩来早期文集》(下)第389—390页。

胡华《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99页。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第377页。

⑪⑫《五四运动文选》第400页,第404页。

⑬钝云《一个留法工学生的信》,转引自森时彦《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第179页。

⑭⑰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第15页。

⑱《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载于《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⑲《欢迎新工人重新出版》,载于《赤光》1923年第17期。

⑳㉑㉒㉓㉔㉕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分册第29页,第30—31、33页,第33、36页,第34页,第35页,第23页,第2—3页,第10页,第22页,第30页。

[作者简介]卫金桂,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副教授,博士;

王章维,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禾子]